

文学及语言

# 东汉关中外戚幕府 “关中色彩”的盛衰\*

刘德杰

【提要】人的地域意识越强，行为中的地域色彩就越浓。东汉前期关中外戚故土意识很强，其幕府“关中色彩”也很突出：辟举士人皆以关中士为主，关中幕僚倍受器重。从顺帝朝始，关中外戚幕府“关中色彩”逐渐弱化：被辟举的关中士越来越少且不受重视。东汉外戚幕府中的关中文士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关中色调”也呈现前强后弱的走势。关中外戚幕府“关中色彩”的演变，实为关中政治文化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东汉文学 关中外戚幕府 关中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4) 03—0096—05

地域意识，尤其是故土意识，是一种普遍的带有地域倾向性的文化心理。地域意识往往外化成地域倾向性行为，历史上常见的地域势力无一不是依托地域意识而产生。东汉外戚主要由两大集团组成——关中士族、南阳士族，他们对东汉政治、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既往的汉代外戚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很少关注。其实，东汉外戚几乎都是文化世家，大多数文学名士都和外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名士的密集度及文化交流的活跃度而言，东汉外戚幕府仅次于东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一、马、窦外戚关中意识强烈

作为秦汉京畿，关中繁华了二百余年，关

中人地域优越心理积累已深，即使合族迁居中州已数十年，这种地域情愫仍很强烈。马防、窦宪就是典型。当他们以外戚贵显时，强烈的关中意识便彰显无余，其突出表现就是广交关中士族。

扶风马氏是三辅著姓。马援文韬武略，“腾声三辅”，南征北战，功勋赫赫。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立马援女为后。明帝对外戚防范甚严，马氏虽贵，权位却不高。不过，章帝自小为马皇后所养，母子情意甚笃。章帝即位，马氏迅即飞黄腾达。

马廖、马防、马光兄弟以皇舅之尊官至九卿，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研究》(10BZW033)的阶段成果。

泛揽声誉，广散钱财，极力笼络关中士族。马防兄弟宾客满门，但京兆杜笃最受宠幸；赠给人物众多，却是清一色关中人，尤其是“三辅衣冠”。马家贵宠之时，在洛阳的关中士族几乎都被马氏涂上了“关中色彩”。

车骑将军马防幕府是关中文学名士的得意场。马防明晓边事，谙熟礼学，且有文才，曾上疏论迎气，章帝纳之，其文今存。马防幕府文士，姓名可考者只有从事中郎杜笃和军司马傅毅，皆关中人。马防幕府关中色彩太强，对杜笃太过宠重，遭到朝臣弹劾。有司奏言：“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sup>①</sup>马防尊崇傅毅，待以师友之礼。傅毅只是擅长文学，马防却请他担任军司马一职，这只能说明马防对傅毅非常信任。杜笃以目疾二十年不窥京师，马防一请，立即入府，以身殉职，战死疆场。杜笃今存《通边论》和《展武论》，以边俗和军事生活为论题，应是在马防幕府所作。马防交游的文士还有扶风大儒贾逵。章帝爱贾逵才学，怜其贫困，特赐钱二十万，让马防转交给他，事见《后汉书·贾逵传》。看来，章帝也知道马防好交游关中名士，所以故意支持他。东汉外戚势力迅速膨胀正是从章帝尊宠乃至纵容马氏开始的。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章帝立窦融曾孙女为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兄弟悉处显要之位。后兄窦宪，好树朋党，交游、荐士、用人，毫不避嫌，对亲附的关中士族不遗余力予以拉拢，对异己则加以排挤迫害。<sup>②</sup>

窦宪幕府，文学名士众多，但关中士最受信重。和帝立，窦宪拜车骑将军，迁大将军，延揽声誉，广召名士，班固、傅毅、崔骃齐齐入幕，一时间，窦宪幕府文学名扬四海。《后

汉书·窦宪传》曰：“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同书《文苑列传》云：“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窦、班固然世代交好，但窦宪“爱班固而忽崔骃”<sup>③</sup>连章帝都感到不公。窦宪这样做，或另有原因。班、傅都是关中望族，崔骃则是河北寒士，对窦宪而言，获得关中名士支持既可壮大政治实力，又能提升在故土社会的声望，势单力薄的崔骃当然不能与关中士相提并论。<sup>④</sup>据《后汉书》载，大将军窦宪出征，扶风耿秉为副将，班固为中护军，傅毅为司马，三人与窦宪同谋军政，而崔骃只是管文书的主簿；登燕然山时，随行将领不少，却只有耿秉被记录；三大文雄同行，窦宪单让班固撰文纪功；在凉州，窦宪以朝廷名义接纳北单于归降，却让班固行中郎将之职与司马同往。崔骃数十次上奏记劝窦宪加强自律，窦宪却认友为敌，找个借口就把崔骃逐出幕府。窦宪对班、傅、崔的态度恐不免有乡党与异党的分别。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被诛，因党附而受牵连者甚众，姓名可考者有班固、傅毅、扶风耿氏（夔、秉、冲）、扶风马氏（防、光、棱）、京兆宋由、京兆廉范、北地梁讽、南阳邓叠与邓磊、真定郭举及子璜等，邓、郭与窦为姻亲，余皆关中人。故吏受株连是当时通例，马防和宋由并非故吏而受株连，显然是因朋党之故。<sup>⑤</sup>仅从窦氏党羽的地理分布也可看出：窦

① 《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

② 事见《后汉书》卷23《窦宪传》。

③ 《后汉书》卷52《崔骃传》。

④ 崔骃常年游学洛阳，家境贫寒，以《四巡颂》为章帝所知，得章帝荐举而入窦宪幕府。《孔丛子》卷下说：“崔骃学于太学而粮乏”。

⑤ 《后汉书》卷41《宋意传》：“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兄弟贵盛，步兵校尉邓叠、河南尹王调、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党出入宪门，负势放纵。”

宪幕府的关中色彩非常浓厚。

## 二、从梁氏幕府到窦武幕府： 关中色彩由弱化而销匿

顺帝时，梁商以大将军开府，所纳名士的籍贯范围有所扩大，但关中士大幅减少。梁冀继任大将军，关中色彩更加弱化。梁冀对三辅士似乎心存芥蒂，三辅士也不大情愿入其幕府。窦武以大将军开府，辟除掾属和举荐士人均以中州士为主，几乎见不到关中士的影子，其幕府活动也几乎看不到“关中色彩”。

梁商开府六年有余，所辟举的姓名可考的士人有七个，分布在七个郡：汉阳巨览、上党陈龟、汉中李固、汝南周举、扶风马融、陈留杨伦、山阳王畅，关中只有一人。《后汉书·梁商传》：“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李固，汉阳李郃子，周举，汝南名士。同书《马融传》云：“阳嘉二年……大将军梁商表（融）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同书《儒林列传·杨伦传》曰：“阳嘉二年，征（伦）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杨伦，陈留人。梁商举荐的士人，可考者只有山阳名公之子王畅。《后汉书·王畅传》：“大将军梁商特辟举（畅）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梁商辟举士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中倾向，似是避地域朋党之嫌，实际上，这与梁商疏远关中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梁商是梁竦之子，梁统之孙。梁统祖籍安定，高祖父子都先居河东，后迁北地，西汉时，子都子梁桥以豪富迁徙茂陵。西汉末年，梁氏又迁回安定。安定梁氏与三辅士族之间，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地域文化归属，似乎都有天然的隔膜。若论渊源，梁统和窦融曾在河西共过患难，又同时成为外戚，政治地位不差上下。但是，在马、窦、梁三家关系中，马、窦世代

交好，在关中享有崇高声望；梁氏与马、窦都有仇怨，而且，目前看不到梁氏交好关西士族的任何史料，可以推测，安定梁氏在关西社会威望不高。

桓灵之际，窦融玄孙窦武之女为后，武拜大将军开府，幕僚姓名可考者四人：颍川陈寔、泰山羊续、桂阳胡腾、南阳张敞，无一来自关中。窦宪推荐的名士，姓名可考者有琅邪刘猛、颍川李膺、魏郡栾巴、颍川荀昱、广陵刘瑜、河南尹勋，俱为中州名士。窦武辟举士人，中州色彩浓厚，关中色彩几乎销匿。

窦武少以经行著称，名显关西，“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sup>①</sup>与汝南陈蕃、颍川李膺、河间刘淑等互为知音。当时，中州士在政坛文坛都是最有实力最为活跃的群体。再者，关中世族多迁居京畿。安帝以后，三辅频遭羌乱，士族往往避难他乡，而中州为其首选。关中士族对中州士族的依赖性也就愈来愈强。窦武辟举名士，舍关中而取中州，也是情势使然。

## 三、关中外戚幕府文士笔下的 “关中色调”

东汉有六位关中文学家仕于关中外戚幕府，他们都写过有关故土风情的文章。班彪《北征赋》描述了故秦之地的历史沧桑及两汉之际的苍凉景象，流露出深沉的关中情怀。杜笃《论都赋》给予关中全方位的热情讴歌，班固辞赋表达了对关中的深深眷恋，马融辞赋流露的关中情感却很淡漠。赵岐避难他乡，“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sup>②</sup>却是以冷静批判的眼光描述三辅风土人情。“关中情调”在关中文士笔下也呈“衰减”走势：从赞美、眷恋到疏离以至批判。

杜笃《论都赋》和班固《西都赋》都蕴含

<sup>①</sup> 《后汉书》卷69《窦武传》。

<sup>②</sup> 《后汉书》卷64《赵岐传》。

着较强的“西都情结”，这是三辅旧族地域优势心理的延续，也是关中士尚未完全认同洛阳政治文化地位的表现。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前后，光武帝修缮长安殿宇陵庙，引起一场迁都热议。杜笃《论都赋》即为此而作。该赋勾起了“关中耆老”的故土情思。《后汉书·循吏列传》说：“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王）景以官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显然，这里的“耆老”指在洛阳的关中士大夫，他们当时是站在政治文化前沿的实力派。《论都赋》能激起关中人共鸣，引起关东人警觉，其中蕴含的关中情感何其深厚！

《论都赋》看似客观描述关中地理形便，说它成就了秦汉王业。实际上，杜笃是以礼赞“旧京”的姿态运转全文，这很容易触动关中世家的心结——想起昔日的辉煌，产生重建辉煌的梦想。该赋描绘的盛汉图景勾起了关中士对故都的怀念，“世居雍州之利”也很容易引起东汉帝王对先帝成功智慧的思考，如果在洛的关中耆老利用他们的威望鼓动朝廷迁都，势必引起多方骚动，这正是“人情疑惑”所在，王璟的担心不无道理。

班固《两都赋序》一开篇就借关中耆老之口较量两都：“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sup>①</sup>《西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的方式行文，描绘长安的盛世繁华，展现“威戎夸狄”的强汉气象，讴歌士、农、商、工各得其所的生活，给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长安，美哉！西京，壮哉！《东都赋》则以“折以今之法度”的方式展开，把洛都礼仪描绘得雍容肃穆，中规中矩，这很容易引起读者这样的感受：洛都太过庄严，令人拘迫！作为西都繁华的描述者，“客”满怀激情，对西都充满敬慕；作为东都礼仪的描述

者，“主”冷静克制，对东都心怀敬畏。两相比较，西都更让人神往。班固的“关中情”就这样流注到了笔端。

关中山川在班固笔下美丽而亲切。终南山是关中名山，秦岭高峰所在地。班固《终南山赋》中，高峻的终南山“固仙灵之所游集”，美丽而有神韵。这是班固心中的终南山，是他情感化的关中记忆。

杜笃和班固，作为章、和之世外戚幕府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笔下的“关中情调”既表述了那个时代关中士的故土情结，也反映了关中士的文化自信与地域自豪感。

到了顺、桓之世，关中政治文化优势已风华不再，安定梁氏父子与关中的关系也并不“亲密”。梁商幕府的马融心理上早已“疏远”乃至“逃离”了关中，在他笔下，关中不再亲切，甚至有点沉寂落寞，他的辞赋屡次表露了如是心迹。

《长笛赋序》叙作赋缘起说：“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平阳邬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sup>②</sup>此赋作于扶风督邮任上，当时，马融很闲散，心有孤独，忽听有人吹奏相和曲，不由想起京师，悲喜交加，感而作赋。洛阳人、相和曲，这是繁东京洛的标志。官场失意之凄凉，远离京师之悲怨，“相逢旧相识”之欢乐，一起涌上心头。赋文将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设在险峻孤寂的终南山北崖，这是作者自命清高又孤寂落寞的心理投射。马融笔下的关中生疏而冷寂。

《琴赋》流露出的写作心境与《长笛赋》相似。该赋说：“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邀闲公子，中道失志，居无室庐，罔所自置。”<sup>③</sup>梧桐形象寄寓着作者漂泊孤独之感。生

① 萧统：《文选》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萧统：《文选》卷18。

③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18《马融文》。

活在故土却觉得飘泊异乡，这恰恰反映了马融与关中的心理隔膜。《檇蒲赋》也表露了对洛阳生活的眷恋，且流露出逃离故土之意。

在晚年所作的《自叙》里，马融写到早年的经历：“大将军邓骞召为舍人。弃游武都，会羌虏起，自关以西道断。融以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因往应之，为校书郎。”<sup>①</sup>该文流露的，是对关中饥饿动乱生活的恐惧和急于逃离的心情，看不到对故土的眷恋、同情或是惋惜。

同是关中，在班固笔下壮美富庶，在马融笔下混乱破败；同是终南山，在班固笔下美丽亲切，在马融笔下冷寂而隔膜。固然可以从宦海沉浮或一时感受来理解，若结合笔下二人一以贯之的“关中色调”，这迥异的感受恐怕就有普遍象征意味了。

赵岐《三辅决录序》描述三辅风俗说：“五方之俗杂会，非一国之风。……其土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俗失则趣势进权，唯利是视。余以不才，生于西土。耳能听而闻故老之言，目

能视而见衣冠之俦，心能识而观其贤愚……”。可以看出，写《三辅决录》时，赵岐对三辅的评价无所依违，冷静，理智，不亲不疏，这是“国士”对“国土”的态度，既别于杜笃和班固的热爱，也异于马融的生疏。

关中文士用文笔描绘了关中的沧桑变迁，浓淡淡的关中情调既透出曾为京都人的自豪与优越感，也流露出对故土繁华一去不返的沉重叹息。东汉关中外戚幕府文学“关中色调”的变化，也是关中政治文化地位兴衰演变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河南教育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届文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sup>①</sup>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 The Rise and Fall of Shogunate of Guanzhong Gaiseki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iu Dejie

**Abstract:** The stronger regional consciousness is, the more obvious regional tendency in behavior is. The homeland consciousness of gaisekis from Guanzhong was strong and the “Guanzhong color” of their Shoguns was also obvious in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y were in favor of the persons from Guanzhong in appointing subordinates and in recommending talented person to Royal administration. “Guanzhong color” gradually weakened from Shun-emperor era; Fewer Guanzhong persons were appointed or recommended, or being appreciated. Meanwhile, “Guanzhong complex” started to become weak from strong in the works of Guanzhong writers. 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status change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Guanzhong.

**Keywords:** literatur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shogunate of Guanzhong gaiseki; Guanzhong complex